



新编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中国文学史

(下)

第三版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袁世硕 张可礼 主编



- | | |
|-------------------------------------------------------|-------------|
| 高等基础写作训练教程（第二版）
（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 马正平 |
| 汉语史纲要（第二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 殷国光 龙国富 赵 彤 |
|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六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 陆贵山 |
| 美学概论（第四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 牛宏宝 |
| 唐诗宋词鉴赏（第二版） | 张明非 李 翰 韩忠艳 |
| 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第七版） | 朱维之 赵 澧 黄晋凯 |
| 外国文学简编 [亚非部分]（第五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 梁立基 何乃英 |
| 文学理论实用教程（第二版） | 杨守森 周 波 |
| 现代汉语（第二版） | 张谊生 |
| 新编文学理论（第二版） | 童庆炳 |
| 新编西方文论教程（第二版） | 杨守森 孙书文 |
| 影视文学教程 | 陈 阳 |
| 语言学概论（第四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 岑运强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要（第三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 冯希哲 |
|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简编（第二版） | 袁世硕 |
| 中国民间文学概论（第三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 黄 涛 |
| 中国文化概论（第三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 金元浦 |
|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上下） | 袁世硕 张可礼 |
| 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三版）
（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 刘 勇 |
| 中文学位论文写作（第二版） | 卢卓群 普丽华 |

了解图书信息 下载教学资源

www.crup.com.cn

ISBN 978-7-300-27600-7



9 787300 276007 >

定价：99.90元（上、下册）



新编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中国文学史

(下)

第三版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袁世硕 张可礼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史: 上下/袁世硕, 张可礼主编. —3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1
新编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27600-7

I. ①中… II. ①袁… ②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37131 号

新编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中国文学史 (第三版) (上下)

袁世硕 张可礼 主编

Zhongguo Wenxue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印 张 48

字 数 1 112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3 版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9.90 元 (上、下册)

目 录

下 册

第二十四章	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	383
第一节	宋初的文学风气	384
第二节	诗文革新的起因与意义	386
第三节	欧阳修、王安石的散文与诗歌	388
第四节	苏舜钦、梅尧臣的诗歌	392
第二十五章	北宋词坛	396
第一节	晏殊、欧阳修对五代词风的因革	397
第二节	柳永词的新变	399
第三节	秦观、周邦彦、李清照与北宋后期的婉约词	402
第二十六章	苏 轼	407
第一节	苏轼的生平与文学观	408
第二节	苏轼诗歌与宋诗风的形成	409
第三节	苏轼散文的风格特色	413
第四节	苏轼豪放词对词体的开拓	416
第二十七章	江西诗派	419
第一节	黄庭坚与山谷体	420
第二节	陈师道与后山体	423
第三节	江西诗派的嬗变	425
第二十八章	中兴诗人与陆游	429
第一节	杨万里和范成大	430
第二节	陆游的创作道路	434
第三节	陆游诗歌的爱国精神与艺术成就	436
第二十九章	辛弃疾及南宋词人	441
第一节	辛弃疾的生平	442
第二节	辛弃疾对词境的革新与创变	443
第三节	南宋格律派词人	446
第三十章	元好问与金元诗歌	453
第一节	金代国朝派诗人	454
第二节	元好问的诗歌	456
第三节	元诗四大家及其他诗人	459
第四节	杨维桢与铁崖体	469

第三十一章	宋元话本与诸宫调	472
第一节	说话四家与话本体制	473
第二节	小说话本	475
第三节	讲史话本	478
第四节	诸宫调	479
第三十二章	关汉卿与元杂剧的兴起	484
第一节	元杂剧的形成与体例	485
第二节	元杂剧的繁荣	488
第三节	关汉卿的悲喜剧	492
第三十三章	王实甫、白朴和马致远	496
第一节	王实甫与《西厢记》	497
第二节	白朴与《梧桐雨》	499
第三节	马致远与《汉宫秋》	501
第三十四章	元代散曲	504
第一节	小令与套数	505
第二节	前期的散曲	507
第三节	后期的散曲	510
第三十五章	南戏与《琵琶记》	513
第一节	南戏的形成及其体制	514
第二节	四大南戏	515
第三节	高明与《琵琶记》	517
第三十六章	《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	520
第一节	《三国志演义》	521
第二节	《水浒传》	525
第三节	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与英雄传奇小说	529
第三十七章	明前期诗文	534
第一节	由元入明的诗文	535
第二节	台阁体与茶陵派	540
第三十八章	明中期的诗文复古	543
第一节	前七子的文学复古	544
第二节	后七子的文学复古	546
第三节	唐宋派	549
第三十九章	明后期诗文	553
第一节	李贽与公安派、竟陵派	554
第二节	率真轻灵的小品文	558
第三节	明末的文学社团	562
第四十章	汤显祖与明代戏曲	565
第一节	明代杂剧	566
第二节	明代传奇	569
第三节	汤显祖与临川派	573

第四节	明代散曲	580
第四十一章	《西游记》《金瓶梅》及其他神魔、世情小说	584
第一节	《西游记》	585
第二节	《封神演义》与其他神魔小说	588
第三节	《金瓶梅》	591
第四节	《醒世姻缘传》与其他世情小说	594
第四十二章	“三言”与话本小说	597
第一节	话本小说的繁荣	598
第二节	冯梦龙的“三言”	599
第三节	凌濛初的“二拍”	602
第四节	李渔的小说创作	604
第四十三章	清初诗文词的繁荣	607
第一节	遗民诗	608
第二节	文坛领袖钱谦益与吴伟业	613
第三节	王士禛与“国朝”六大家	618
第四节	三大家与散文的转变	621
第五节	词的复兴	623
第四十四章	《长生殿》与《桃花扇》	629
第一节	清初戏曲	630
第二节	《长生殿》	634
第三节	《桃花扇》	637
第四节	戏曲创作的案头化与花部的兴起	640
第四十五章	《聊斋志异》与明清文言小说	643
第一节	明清文言小说创作概况	644
第二节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成书	646
第三节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涵	648
第四节	《聊斋志异》的艺术创新	652
第五节	《聊斋志异》的余响	654
第四十六章	《儒林外史》与《红楼梦》	657
第一节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658
第二节	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创作	662
第三节	《红楼梦》的人生感悟与悲剧精神	664
第四节	《红楼梦》的人物塑造与叙事艺术	667
第四十七章	清中期的诗文词	672
第一节	乾嘉时期的诗说与诗坛（上）	673
第二节	乾嘉时期的诗说与诗坛（下）	678
第三节	桐城派与散文的多元并进	682
第四节	常州词派的兴起	687
第四十八章	龚自珍与近代前期诗文词	690
第一节	龚自珍的生平思想与文学观念	691

第二节	龚自珍的诗词	693
第三节	龚自珍的散文	696
第四节	战争中的爱国诗潮	699
第五节	桐城中兴与散文新变	702
第六节	宋诗派、常州派及其他	705
第四十九章	黄遵宪与梁启超	709
第一节	近代文学革新运动	710
第二节	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	713
第三节	梁启超与新文体	716
第五十章	近代小说	720
第一节	侠义公案小说	721
第二节	近代初期的言情小说	723
第三节	谴责小说	727
第四节	《老残游记》和《孽海花》	730
第五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小说	734
第五十一章	近代后期的诗文词	738
第一节	近代后期散文	739
第二节	南社、同光体与近代后期诗歌	742
第三节	四大词人与近代后期词	747

第二十四章

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

公元960年，宋王朝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继唐代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时代，它与“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欧阳修《本论》）的五代完全不同了。宋初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文人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褒扬，其参与社会、实现自我的机遇大大增加。就科举一道来说，仁宗一朝四十二年中，中进士者就有四千五百七十人；进士之外，又有诸科，常选之外，又设制科、童子举。这样，每年入选名额竟逾千人。入仕必然成为士人择业的首选。

宋朝在政治上也是最开明的时代之一，自太祖赵匡胤提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规定以后，“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宋稗类钞》卷一）便成为一种传统，虽然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依然有压制和迫害的事件发生，但毕竟为一代优秀士人展现了一个光明且极富理想魅力的前景。再加上开国数十年和平、安定的环境，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繁荣局面的逐步形成，都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氛围。这种氛围对文学创作自然具有感召和鼓舞作用，给予人们的文学观以新的刺激和启发。

宋初的半个世纪里，文学依然延续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它与现实的关系尚没有及时得到调整。当时流行的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就代表了前代的文学传统。这种情况一直到仁宗时期，随着社会变革的出现才得以真正改观。

第一节

宋初的文学风气

宋初诗坛，流行三体：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此三体皆自晚唐五代承袭而来，其中白体持续的时间最长。有人认为，西昆体兴起后，白体即衰落无闻，其实不然。据欧阳修《六一诗话》回忆，真宗后期，晚唐郑谷的诗尚盛行一时，“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郑谷为晚唐的白体诗人，其影响并未因西昆体的兴起而消匿。此外，同书中欧阳修又说：“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可见，此体在宋初半个多世纪中始终存在。目前学界已辨明，所谓白乐天体，并非人们盛称的“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题乐府诗，而是指那些“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之诗。白居易在世时，其乐府诗已“时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而“善状咏风态物色”的闲适篇章却“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闲适诗基本意旨在于娱乐性情，涵养一种满足平和的精神状态，这是士大夫文学中的必有之意，与其生活状况颇相吻合，它为后代所效仿，不仅仅在“得于容易”。

晚唐五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士大夫更多地注重娱乐，遑及其他，于是白体便大行其道。延及宋初，一批五代入宋的作家依然畅续其风。张耒曾指出：“宋兴，锄叛而讨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试，休养生息，日趋于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于其时者，谈笑佚乐，无复向者幽忧不平之气，天下之文章稍稍兴起。”（《上曾子固龙图书》）可见，这类作品恰恰是当时士大夫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白体属于在朝士大夫的文学，那么，晚唐体便是在野隐居之士的文学。在晚唐派作家中，唯有寇准在朝中任职，且一度为相，不过他的成名作恰恰不是在朝时，而是早年任巴东知县和晚年贬谪南方时所作，诸如“恐朝金马去，还失白莲期”（《题巴东寺》）、“何日忘簪绂，深居石室间”（《荆南秋望》）等，诗中表达的仍是向往隐逸之情。与寇准同时的晚唐派作家赵湘也确曾出任过庐江尉，其作品则多写山间幽居之情，“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南阳集》），与隐居诗人极为相近。其他作家则非为隐士，便是僧人了。最具代表性的僧侣作家就是“九僧”，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记载，所谓“九僧”乃是指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和怀古九位诗人。一般认为，晚唐体创自贾岛、姚合，这一派在唐末五代拥有相当大的势力，足与白体相抗。五代时僧侣诗人贯休、齐己是此派的代表作家，名耸一时，显然影响了宋初的诗坛。自五代入宋的廖融、王元、孟贯等人皆有与之相近的创作，可视为宋代晚唐体的先声，以后九僧、潘阆、魏野、寇准、林逋等人继起，将该派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晚唐体又称苦吟派，取径不止于晚唐的贾岛和姚合，又上溯到大历诸子。所谓苦吟，并非只就词句而言，在追求灵感的执着方面也是如此。试看潘阆的“败叶声如雨，狂风响似雷”（《钱塘秋夕旅舍感怀》），魏野的“眼明山雨后，发乱晚风前”（《村居述怀》），寇准的“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春日登楼怀归》），以及林逋的咏梅诸佳作，就会明了这一点。当然，晚唐派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欧阳修曾讥嘲九僧作诗离不开山、水、风、云、竹、石等字，用词范围狭窄。其实晚唐派的狭窄不只是在用词上，他们的精神世界从来就没有跨出过某种定式，这就是在自然中寻找自己的隐居情趣，从前人的创作里搜寻表达的方式和材料，这种创作态度跟时代生活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三派中西昆体崛起最晚，形成于真宗时期，而后来居上，造成了轰动效应。西昆体由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位翰林大臣倡导，艺术上宗法李商隐，追求精丽典雅的艺术风格。从内容方面看，西昆体的作品里有相当的言情之作，也有讽喻君王的内容，还有歌颂太平、感叹兴亡、羡慕归隐的。有人认为，西昆体的雍容华贵、典雅整饬体现了宋王朝作为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事实。然而，这种说法没有把握住西昆体的实质。总的来说，西昆体属于一种宫廷文学，是翰林大臣们在皇家图书馆编纂《册府元龟》之余的消遣行为，既不能当作情感的依托，也不能当作针砭时弊的良药，与他们崇尚的李商隐诗之意蕴亦无关系。范仲淹曾经指出：“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悖悖相滥。”（《唐异诗序》）这击中了西昆体的要害。

西昆体不仅仅是一个诗歌流派，它同时也代表了当时的骈体文风气。欧阳修曾经指出：“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记旧本韩文后》）又说：“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相撻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苏氏文集序》）骈体文又称“四六文”，即《宋史·文苑传》提到的“唐人声律之体”，讲求“属对精切，致意缜密”，形式美的因素尤其突出。宋初的骈体文在内容方面大多空洞和虚泛，过分追求形式的精工，范仲淹对当时的文风有一个比较简练的评价，即“文章柔靡，风俗巧伪”（《上时相议制举书》），这既是指诗歌而言，也是指文章而言，充分说明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学风气并不健康。

在上述三体流行期间，也有一些作家起来表示反对。太宗时期的柳开和王禹偁就是两位突出的代表。柳开强调继承韩愈“文以明道”的传统，反对自享其乐的文学；而王禹偁本人的诗歌和散文均以关注现实为主，创作成就颇为可观。他们属于文学革新的先驱。前人有将王禹偁归入白体作家一类的，应该说，王本人早期确也有这方面的创作，但自遭受贬谪后，诗风一变，转而追随白居易的新乐府传统，其文学观念也就随之改变了。但是，前期这样的作家并不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起而响应者只有极少数人，士大夫文学依然在惯性的轨道上行进，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并没有得到调整。这种情况一直到社会变革爆发以及欧阳修出现以后才得以真正改观。社会变革成为文学局面发生转变的真正契机。



第二节

诗文革新的起因与意义

仁宗时期，发生了一场政治变革，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这与北宋社会存在的危机是直接相关的。仁宗景祐元年（1034），当时西北的元昊自称嵬名吾祖，开始频繁入侵宋境，杀掠居民，而北部的契丹也乘机屯兵边疆，随时准备南下。宋朝疲弱的边防又加重了这种外部的威胁。另外，国内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构成一种内忧外患的局面。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中指出：“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危机的爆发将一场严峻的考验置于每一个士大夫的面前，是视而不见，态度暧昧，继续“光荣而饱”，还是挺身而出，锐意改革，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选择。以韩琦、富弼和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富有责任感的官员便在这时发动了一场政治变革，其目标主要在于通过改革吏治，惩治腐败，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文学革新派成员就是在这场考验中脱颖而出，与前期的创作倾向划清界限的。他们在当时乃是一批职位不高、入仕途不久的年轻人。其中，京师地区有穆修和苏舜钦。他们早在仁宗天圣年间便开始写作古文、歌诗，“论斥时病，诋诮权贵”（《宋史·穆修传》），揭开了诗文革新的序幕。而洛阳地区，则有欧阳修、尹洙、梅尧臣、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和王几道等人，他们“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相与作为古文”（欧阳修《记日本韩文后》），跟当时的西京留守、西昆派领袖钱惟演拉开了距离。山东方面还有孙复、石介，这些作家从儒学立场出发，也对西昆体发起了猛烈攻击。同时，泰山地区还有一个人称“东州逸党”的作家群，以范讽、石延年、刘潜等为代表，他们以狂放的姿态表达了对平庸现状的不满。这样一批作家的崛起，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他们批判柔靡、巧伪的文风，主张挽救危机，实行改革，并将文学融入社会改革的大潮之中，整个文学风气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应该说，新的文学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种忧世文学。正因如此，在革新派的文学观念中，实用、“救时”便占据着重要地位。欧阳修曾经主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他还劝导别人说：“京东聚群盗，河北点新兵，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听。”（《赠杜默》）苏舜钦同样认为：“诗之原于古，致于用而已。”（《石曼卿诗集序》）梅尧臣则有“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寄滁州欧阳永叔》）的名言。稍后的王安石更将其发展成“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的纲领性论点。这种观念其实正是对白居易新乐府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作为关注现实的文学观，它的优势十分明显。比如对待“时文”，革新派原则上并

不一棍子打死，“偶俚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改革派的散文也每每带有一定量的偶化句子；但骈体文的拘于声病、词句毕竟束缚了作者意念的表达。所以，流畅平易的散文终究占据了主流，这正是实用文学观的胜利。又比如，一度流行于科场的“太学体”是以古文形式出现的，因反骈文之绵软谐熟，走向了新奇、险怪，“毒病唇齿，咀嚼荆棘”（苏辙《祭欧阳少师文》），演为食古不化的怪胎。这种倾向早在真宗时期便受到了王禹偁的批评：“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也。”（《答张扶书》）这种倾向也遭到了欧阳修等人的指斥，欧阳修还利用主贡举的机会对此类险怪文风严加贬抑，扭转了从太学流布出来的这股不良文风。再有，仁宗朝还滋生出一种侈谈性理的倾向，将传统儒学一套风教观念教条化地纳入文学创作中来，高自标榜，无的放矢，当时也受到了主张文以明道的欧阳修的批评：“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以予之所不暇也”，“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答李诩第二书》）。今天来看，宋代文学没有走向空谈义理、脱离生活的道路，功用主义的文学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功用毕竟只是新文学的特点之一。事实上，注意一下革新派的创作实践，就会发现，所谓歌咏生民病、指斥时弊的作品只占了其中的一部分，文学家自我人格的修养和进取精神的激励同样具有重要分量。以梅尧臣为例，他被后世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过去一般认为，他的功绩在于发扬了新乐府精神，为社会担负了批评之责，这是不够的。梅诗的最大价值就在于确立了一种光明磊落、首尾一贯的人生态度，所谓“微生守贫贱，文字出肝胆”（《依韵和晏相公》）。他又说：“我迹固尚贱，我道未尝轻。力遵仁义途，曷畏万里程。安能苟荣禄，扰之复营营。”（《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这种坦荡、爽朗的人生态度是梅尧臣诗歌的主流。当然，梅诗中还有大量描写山水、陶冶性情的作品，它们于梅诗并无损害，反而增加了梅诗的审美厚度。当我们将梅尧臣的诗集作为一个整体审阅时，其精神和人格就非常清楚地显现出来。陆游在《读宛陵先生诗》中称梅尧臣的诗歌“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指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精神的确立。

苏舜钦也是庆历新政失败后贬谪生涯较长的一位作家，他的创作大体上亦具有这种精神。观其后期诗作，有的写得豪放旷达，如《奉酬公素学士见招之作》：“身虽俱在大江外，不得会合烦相邀。秋风八月天地肃，千里明迥草木焦。夕霜惨烈气节劲，激起壮思冲斗杓。岂如儿女但悲感，唧唧吟叹随螿蜩。拟攀飞云抱明月，欲踏海门观怒涛。”有的则写得闲淡从容，如《答章傅》：“废官旅吴门，迹与世俗扫。构亭沧浪间，筑室乔树杪。穷径交圣贤，放意狎鱼鸟。志气内自充，藜藿日亦饱。不图名利场，有士同所好。”至于那些脍炙人口的绘景小诗，同样也显得意蕴非凡，与那些满足于恬散的作品究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庆历年间与范仲淹共同主持新政的名相韩琦，虽不以文章名世，但其《安阳集》五十卷也颇为可观，《四库全书总目》尤赞赏他的诗，“不事雕镂，自然高雅”。其集中多咏物之作，往往寓有寄托。“久为世所传诵”的是咏菊一联：“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九日水阁》）咏竹有：“丹心自觉同高节，青眼相看似故人。不杂器尘终冷淡，饱经霜雪尚精神。”（《枢廷对竹》）皆不失为佳句。特别应提到的是范仲淹，他在改革失败后写给滕宗谅的那篇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提出了著名的“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实际上已成为当时乃至终宋士大夫的人生座右铭。这些当时即被人关注的文学作品、艺术潮流，真正体现了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是那个时期文学思潮的主流，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文学发展到这个时候，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士人的关系才真正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建朝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那种无序的、不协调的文学状况才得到改变，宋代文学至此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灵魂。在这个基础上，后期一个又一个文学高潮相继到来，它们正是这次诗文革新精神的充分展开。

第三节

欧阳修、王安石的散文与诗歌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是诗文革新时期文坛领袖，地位与唐代的韩愈相似，梅尧臣在《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一诗中说：“欧阳今与韩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作为文坛领袖，他的文学成就和韩愈一样，也是多方面的。

欧阳修是一位历史责任感很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兼文学家，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与他的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文学思想与他的政治理想也分不开。欧阳修二十四岁中进士，首任西京留守推官，那时便与尹洙、梅尧臣等人切磋诗文、议论国事。入京任职以后，更以积极的态度参加范仲淹等人领导的庆历改革，与朝中的顽固派和保守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先后两次遭到贬谪。晚年回到朝中，欧阳修的职务逐渐升迁，官至参知政事，依然关心文风的改革，利用权知礼部贡举的机会纠正当时“太学体”险怪奇涩的习气。与此同时，又尽己所能，大力提拔优秀的年轻学者和作家。在政治上，他因屡遭打击，态度较前期有所消沉，但还是敢于负责，尽职尽责。六十五岁致仕，次年病逝于颍州。著有《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基本继承了唐代韩愈的主张，提倡“文以明道”，把文学创作与儒家的思想观念进行结合。但是，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的目的是配合政治改革，反对无病呻吟的西昆体，所以，他在推行这一主张的同时更加注重文学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作用。他说过：“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因此，他的主张就具有了时代的特点，针对性突出，避免了柳开等人在理论上流于空泛的毛病。此外，他十分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认为“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于文学评论方面，又多有精到见解，认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转引自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还提出了文章“穷者而后工”“盖愈穷则愈工”的主张，等等。这使得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在当时很有号召力，起到了领导文坛和凝聚人心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宋初诗文，尚延唐

末、五代之习，柳开、穆修欲变文体，王禹偁欲变诗体，皆力有未逮。欧阳修崛起为雄，力复古格，于时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陈师道、黄庭坚等，皆尚未显。其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欧阳修领导的文学革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他的理论主张比较切合时代需要并具有很强的感召力是分不开的。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一开始他的散文从学习韩愈入手，继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艺术上特点鲜明，与韩愈迥不相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议论文是欧阳修散文的重要部分。他的议论文以政论和史论为主。政论文的代表作有《原弊》《纵囚论》《准诏言事上书》《本论》和《朋党论》等。这些文章剖析时弊，论述透彻，感情充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作于早年的《与高司谏书》是一篇著名的书信式的政论文，作者公开痛斥当时任左司谏的高若讷对革新派落井下石的卑鄙行为，写得光明磊落，充满政治激情。这里仅引其中的两段：

昨日 [余] 安道贬官、[尹] 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 [范] 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像这样的政论文，既义正词严，同时又能从容不迫，进退有度，足显欧阳修文章的风范。

史论文也很有特色。欧阳修独立撰写了《新五代史》，又与宋祁共同撰写了《新唐书》，其中各篇的“序”和“论”皆是潜心构思写成的，议论精到，笔势简练，善于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今天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最著名的《伶官传序》一文，通过总结后唐庄宗成败兴亡的一生，提出了“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以及“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一系列著名论断，这些观点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前后对比，情理相乘，显示出欧阳修承继《史记》传统，并加以拓展和发挥的特点。

欧阳修的记叙文是其散文作品当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其中有一类描述亭园台阁的景物记写得极有特色，脍炙人口的篇章众多，代表作有《夷陵县至喜堂记》《偃虹堤记》《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真州东园记》《有美堂记》《相州昼锦堂记》《岷山亭记》等。这些作品融写景、叙事、议论为一体，曲折婉转，摇曳生姿，蕴含隽永的情味。《醉翁亭记》是其中的典型篇章。此作从立意、章法、描写、语言诸方面都作了精心构思，审美意味极浓，是散文史上的一篇精品。以前仅仅作为应用文看待的亭台记到了欧阳修手下，则成为文学性极强的文体。

碑记类的文章也是十分突出的。欧阳修善于通过传神的形貌描写、语言描写和平凡小事的叙述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品性。流传较广的有《张子野墓志铭》《尹师鲁墓志铭》《祭苏子美文》《祭石曼卿文》《祭梅圣俞文》《泂冈阡表》等。尤其是悼念父母的《泂冈阡表》，写得真挚动人，笔触细腻。文中记其母亲回忆往事的一段：



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

以平易动人的笔触叙述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在其中注入作者的情意，这是欧阳修碑记文的特色。明代归有光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等文，显然受到欧阳修此类文章的影响。

欧阳修的文赋在文学史上也有相当的地位。赋作为一种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文体，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变化，由古赋、骈赋进一步演进成为唐代的律赋，格律化的程度逐渐加深。到欧阳修这里，他大胆地打破传统，走向散文化，并通过文赋这种体裁，状物抒情，自由地书写内心感受。其代表作《秋声赋》，既遵从了赋体的铺陈传统，又自由发挥，散骈交错，成就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对后来的王安石、苏轼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的来说，欧阳修散文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平易流畅。作者扬弃了韩愈散文中古奥艰涩的成分，章法上也不作大开大阖、起伏跌宕之势，就像平缓流动的溪水，显得亲切近人。二是精练简洁。欧阳修写文章时均经过推敲，不轻易下笔，语言讲究简洁、凝练，表达精确，没有芜词。三是饱含情感。作者无论是叙述还是议论，行文中均带有丰富的情感色彩，它们有时含而不露，有时喟然发一感慨，造成一种含蓄委婉、摇曳生姿的态势。后人称此为“六一风神”。

欧阳修的诗歌现存八百六十余首，成就上不如散文突出，但是也具有自己的特色，既不同于西昆诸体，和唐诗也有所区别，整体上倾向于散文化、议论化，初步显露出了宋诗的面貌。

与散文一样，欧阳修诗集中有一部分直接介入现实、干预政治的作品，比如《食糟民》，揭露官吏饱食终日，“日饮官酒诚可乐”，辛苦劳作的农民却只能买酒糟充饥，“釜无糜粥度冬春”。又比如《边户》，反映了宋辽边境地区的居民“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的苦恼，讽刺了宋王朝的对外妥协政策。

欧阳修的七言古体诗明显具有散文化倾向，融议论、叙事、抒情于一体，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韩愈的影响。比如他自认为得意的咏王昭君的两首诗，其第二首云：“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纯粹以议论深刻、语句通畅见长，“专以气格为主”（叶梦得《石林诗话》），体现了其审美风格。

近体诗则清新自然，摆脱了西昆体喜好雕琢的弊病，平淡之中流露出开阔的胸襟，如《戏答元珍》《黄溪夜泊》等作，与唐诗相比，仍然显示出散文化的特点。

欧阳修的诗歌在宋诗风格形成的过程中具有自己的贡献和价值，但影响不及他的散文和词大。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十九岁时，因父亲任职江宁，遂全家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晚年封荆国公，死后追封舒王，谥号文，世称王荆公、舒王、王文公、王临川。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又是杰



出的文学家。二十二岁时中进士，曾经在鄞县、舒州、饶州等地担任知县或通判等职。四十九岁被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迁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力排众议，推行新政。在六七年的时间里，王安石议定并实行了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等新法，力图通过一系列理财、整军的措施，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的做法在一定时期内确实收到了相当的实效。但是，新法严重触犯了官僚大贾的利益，因而遭到朝中旧党的激烈反对。王安石最后被迫辞职，退居江宁。神宗逝世后，新法遭全面废弃，六十六岁的王安石竟抑郁而死。

在文学主张上，王安石和欧阳修一脉相承，强调“以适用为本”，“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坚决反对西昆体“以雕绘语句为清新”，他无疑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后劲。由于从政治家的立场出发，王安石的主张对文学自身的价值估计有所不足，在某些方面较多地带有政治功利色彩。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成就突出。他的散文以议论和说理见长，风格冷峻，很少委婉、生动的细节描写，但见解深刻、议论透辟。《游褒禅山记》是他的游记代表作，写作风格与欧阳修完全不同，不作景物的细致描绘和游览过程的详尽叙述，而在于借题发挥，探讨有志者如何追求事业的成功。在王安石的文集里，议论性散文占的比例最大，往往立意新颖，见解独特，能言人所未言，给读者以启迪。如《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孔子世家议》《太古》《伤仲永》等，均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里举一篇散文赋以示：

龙之为物，能合能散，能潜能见，能弱能强，能微能章。惟不可见，所以莫知其乡；惟不可畜，所以异于牛羊。变而不可测，动而不可驯，则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为仁。为仁无止，则常至乎丧己，而未始至乎丧己，夫此所以为智。止则身安，曰惟知几；动则物利，曰惟知时。然则龙终不可见乎？曰：与为类者常见之。（《龙赋》）

这篇小赋，在语言、写法上已经完全散文化了，属于一篇寓言式的小品。作者并不对龙作详细的形貌描写，却充分发挥他的理性智慧，借龙这一传说中的神物来表达自己的处世哲学，阐述心目中的人格理想。通篇文章在精彩迭出的议论中闪烁着智性的光辉。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也卓有成就，严羽《沧浪诗话》称其为“王荆公体”。在一千六百余首的作品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社会现实、政治改革的关注。比如《省兵》《兼并》《感事》《秃山》《促织》《河北民》《白沟行》等等。他还有不少咏史和怀古的作品，或借历史人物寄托个人抱负，或总结历史教训，或表达个人的独特史识。比如《金陵怀古》《开元行》《贾生》《孟子》《商鞅》《诸葛武侯》等。其中两首《明妃曲》尤为突出，立意迥别于前人，在诗坛上曾引起强烈反响，欧阳修、梅尧臣、曾巩、司马光等人都写了和诗。这里引其一首以示：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